

博瑞森
BRACE
人文丛书

张再林
哲学作品集

中西哲学的 歧异与会通

张再林◎著

Zhang zai lin
Philosophy Work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海外学

张再林
哲学作品集

中西哲学的 歧异与会通

张再林◎著

Zhang zai lin
Philosophy Work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张再林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402-4569-6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比较哲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5140 号

书 名: 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作 者: 张再林

责任编辑: 满 懿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网 址: <http://www.bjyspress.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 65240430

电子信箱: bjyspress@126.com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45 毫米×210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90 元

这是一本有关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或学术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其身份的合法性似乎一直受到某些专业人士的质疑。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都尚且成为问题，遑论所谓的中西哲学比较这样的问题。然而，尽管面临诸多非议，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日渐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事实。几代海外学者在这方面结下的累累研究硕果自不待言，近些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国内的悄然升温便是其有力佐证。在国内从事比较研究的治学者当中，既有一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又有像张世英教授这样一批老一辈的长期致力于西学研究的学卓诣精、德高望重的专家。而国内老一辈学者这一“出入佛老，又返之六经”、从西学转向中学的学术经历表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学术运动已呈欲罢不能之势。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所以在今天依然使很多学者难以释怀地涉身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该研究所特有的和至今未能解脱的问题情境。这种问题情境就是，由于人类的看似不可逆转的所谓“现代化”进程、由于西方文明的几乎所向披靡的胜利，东方文明的创巨痛深和其所处的危若累卵、岌岌可危的历史处境。它不仅使具有黄金般古老而自信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使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开始致诘自己长期浸淫于其中的业已习成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特定的解释学语境，使中国学人开始以西方文化文本为理论参照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文本给予重新的定位和解读，借以重新为整个民族也为自己的个体生命寻找安身立命之基、精神和心灵寄托委任之处。因此，中西哲学比较之治学之初衷与其说是由于一种知识论的致思兴趣，不如说是更多地出于一种切身的存在主义式的忧患意识，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心思及境界迥非那些习惯于从知解上入思的所谓专业化的学问家们所能领悟。

其实，动力还来自西方文化一翼。中西哲学比较之所以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今日之显学，除源自东方文化的危机外还得力于西方文化本身不可救治的衰落。诚如施特劳斯所说，西方文化“大难临头，依然歌舞升平”。尽管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已成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话语，尽管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业已取得了似乎不可逆转的骄人的胜利，但以古希腊的知识论取向为其主要传统的该文化却盛极而衰地日渐暴露出其自身深层的矛盾和内在的不足，在历史辩证法的鞭策下同样难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其实际上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从近代就开始的西方蜂拥而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对古希

希腊单维的哲学传统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和检讨即是其困境的印证。因此，实际上，正如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我们看到一种对其传统的生存论的反思那样，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我们亦看到一种对其传统的生命根基的质疑运动；同时，正如时代正在召唤着中国文化走出“中央之国”的自恋误区以把自己纳入世界性的视域中那样，时代亦开始召唤着西方文化克服其旁若无人的私语症时而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从事“两造之至深根源的会通”（施特劳斯语）。

这种文化的双向互动运动表明，中西哲学比较已不再是以个别民族为单位的微观的比较，而是基于普遍人类族类的立场的宏观的比较，其所涉的思考也已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技术性的思考，而是一种浸濡着生命感和历史厚重的攸关整个人类命运的根本性思考，即担荷起人类终极关怀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更具普遍性的比较、这种更具终极性的思考也正是本书的主题。本书之区别于其他中西哲学比较专著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不仅试图从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宗教学、语言哲学及政治哲学等多个层面对中西哲学给予一种全方位的比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比较中，通过对诸如现象学、舍勒哲学、对话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施特劳斯哲学、阿佩尔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深入解读和思考，通过一种从中所透显出的与西风东渐相对应的堪称东风西渐的当代哲学运动，在一种中西哲学双向互动之中以揭示中西文化会通之旨，即不同民族之于共同的普世性的类哲学的趣向之旨。

因此，本书显然并不忽视中西哲学之间存有的巨大差异，并指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的）基于主客维度的真值

取向与（中国的）基于主体间维度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但与此同时，本书更多关注和强调的不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而是中西哲学之间的会通。本书旨在说明，就其实质而言，上述两种取向并非可以独立自存而是恰恰内包在一种互涵的机制之中，而无论是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实际上都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的方式、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为这一互涵机制做出了说明。就此而言，中西哲学双方毋宁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其区别仅仅是话语形式的不同而非言说实质的不同，其区别仅仅是“流”的不同而非“源”的不同、“途”的不同而非“归”的不同，或换言之，无论二者所表现出的历史上的取向多么不同，它们都最终异流而同源、殊途而同归地终于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类的“大一”生命的不息流行之中。

这是一种堪称“消解比较”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提出并非旨在反对文化上的多元论，而是在希冀根除文化上的不宽容主义的同时，旨在捍卫实际上为每一种文化、也为每一个人所共同支撑和共同依据的类的普遍价值、类的普遍理想之无上尊严。因此，这种“消解比较”意味着本书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就其方法论而言，这种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也即被今天后现代主义所力斥的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它以“一”取代“多”、以“我”取代“我们”，以一种“举一废百”方式实现着对并行不悖的人类之大道、普世的天下之公道的思想上的僭越和强暴。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坚持“语言是存在的家”一样，语言同样也可看作是文化的家，“实际上正如人类语言中没有一种所谓的‘私人话

语’，任何语言的自身的‘现实价值’都有赖于语言社会的‘流通价值’那样，在人类文化中也不应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独白主义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语言的建构，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中使自己赖以成立，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中维持了其活的生机”。（参见本书“从阿佩尔哲学看中西文化的会通”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在今天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似乎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原来的西方文明中心说演变为种种新形式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其在“全球一体化”这一时代大旗下继续维护着其对其他民族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而原来的东方文化本位说则以所谓的“亚洲价值特殊论”披挂登场，其已不加掩饰地和不可救药地沦为一种辩护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袒，并以之为遁词公然地为肆意践踏普遍人类价值这一行径而张目。其实，正如作者一再指出的那样，一种文化就其作为文化而言，就其作为普世人类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而言，它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并且更为深入地研究将会发现，像“民主”“科学”“法制”等这些素被人们视为舶来品的理念，也并非仅仅为西方文化所独具，而是其作为一种普通之人性规定、普遍之社会理想，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文化中亦古已有之。因此，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之最重要的工作并非不无决绝地推倒“孔家店”，并非之于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借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和以新的可公度性语言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予一种现代化的诠释和解读。

张再林

上 编

- 一、理想的认识论与日常的认识论
——中西认识论的歧异与会通 003
- 二、智的本体论与爱的本体论
——中西本体论的歧异与会通 017
- 三、认知的伦理学与直觉的伦理学
——中西伦理学的歧异与会通 036
- 四、主客关系的美学与主体间关系的美学
——中西美学的歧异与会通 050
- 五、外在的超越与内在的超越
——中西宗教观的歧异与会通 065

六、爱知之学与成人之教

——中西哲学观的歧异与会通 099

七、语义学的语言哲学与语用学的语言哲学

——中西语言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119

八、理性之治与德性之治

——中西政治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147

下 编

九、对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189

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199

十一、西方现代现象学与中国唯识论学说 215

十二、“面向事物本身”与庄学精神 231

十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四大理论转向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246

十四、西方社群主义与儒家政治哲学 259

十五、从阿佩尔哲学看中西文化的会通 280

上 编

一、理想的认识论与日常的认识论——中西认识论的歧异与会通

正如分析哲学中有理想的语言学派与日常的语言学派之间的分野一样，我们将提出“理想的认识论”与“日常的认识论”这两个概念以表示中西认识论之间的区别。

(一)

传统的西方认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想的认识论的学说。在这里，“理想”一词意指高于现实的和终极指向的东西。故所谓理想的认识论，是指一种与常识的认识理论相区别的非常识的认识理论，一种以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正如常识满足于对常规思维的习以为常一样，理想的认识则始于对常规思维的理性超越和存疑待审。就此而言，理想的认识论不失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真正认识论：它要求

我们破除之于常规思维的积习和迷信，揭示“认识之为认识”的绝对无可置疑的坚实依据，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极其理想的科学理论。

这种理想的认识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始开端倪。柏拉图不仅把哲学定义为“爱知”，由此而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唯知识论的致思取向，而且还从中为我们区分出知识与意见，也即理念与现象这两种认识对象。如果说现象作为凡人的肉眼的“看”的对象是一种相对的、易变的和不真实的表象的话，那么理念作为哲学家的精神的“看”的对象^①，则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和真实的表象，因此，在他看来，知识的理论其实就是“表象的理论”。而在诸表象中，唯有理念这类表象才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它作为一种极其精确的“特许表象”，是一切认识现象的基础并代表了人类认识追求的终极理想。

柏拉图的工作毋宁说为我们预示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方向。一部西方的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这一理想的认识论的脚注和补充。自近代以来，柏拉图的唯知主义逐渐朗现为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认识论转向，而从中又出现了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的双雄对立。但是，这种认识上的互争雄长并没有掩盖其实质上对柏拉图所开创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共同的皈依。从柏拉图的绝对的认知理念出发，如果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认识路线由外及内地把人类的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精确的“内视表象”的话，那么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路线则

^① 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陈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1页。按陈康先生的解释，“理念”（eidos）一词的原意是动词“看”，因此“理念”即所看之“相”。

由内及外地把人类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精确的“外视表象”。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这种“内视表象”还是这种“外视表象”，作为一种绝对理念的变种都不失为一种新型的特许表象的理论。这一事实表明，近代哲学家的种种努力依然没有走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阴影，他们不过是用一种新的绝对表象的膜拜取代了柏拉图的旧的绝对表象的图腾。

耐人寻思的是，这种对柏拉图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承继并没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止步而是日趋登峰造极，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以反传统主义者自诩并纷纷宣称自己是柏拉图的不肖子孙。而这种继承实际上是在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这两大哲学派别之间展开的。如果说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可看作是笛卡尔的“内视表象”学说的继续，并最终走向了一种以“先验自我”为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旗号的所谓的“严格的科学”的话，那么以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则可看作是洛克的“外视表象”学说的继续，并最终走向了以“原子事实”为基础、以科学主义为旗号的所谓的“理想的语言”的学说。人们看到，西方传统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毋宁说已经在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在西方现代分析哲学中发展出了最极端的形式和找到了其最终的归宿。维特根斯坦不仅为我们推出了一种“名称与对象相应，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应，语言系统与整个世界相应”的极其严格的“图像说”，而且还不无踌躇满志地宣布“问题基本上已最后解决了”，以至于高枕无忧地一度完全中止了自己的哲学探索。

因此，从柏拉图到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一部西方的认识论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揭示一种精确的特许表象的历史，也即罗蒂所说的“基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历史。这种所谓的“基础主义”断言人类的知识具有某种坚实而不可易移的基础,该基础是本源性的和非推论的,其既为整个科学世界赖以存在的先决前提,又为该世界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故基础主义最终必然通向还原主义和分析主义。不仅英美科学主义哲学以“语言分析”为其归宿,而且大陆人本主义哲学最后亦不能离开所谓“现象的还原”的方法之助。林语堂讲,“西方人生而有刀在他们脑里”。他们像一位冷面的解剖大师,手挥锋利的奥卡姆之刀把世界解析为始基、原子、单子等这些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元,并以此为原材料使一幢幢美轮美奂的科学大厦得以构建。

然而,随着现代解释学这一现象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如日中天的崛起,这种极其理想的认识论已开始楚歌声起而危机四伏。而这种危机首当其冲地出现在追求极其精确的理想表象这一先入为主的设定上。在现代解释学看来,就其实质而言,真理的发现毋宁说是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而非一种镜像式的“说明”,而理解之为理解又最终取决于解读者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前理解”的“视域”。因此,正如在物理学中不相对一定的参照系就不能谈论物体的运动位置或速度一样,脱离了这种一定的视域也无法解读文本自身的内容。这样,人类的认识活动最终表明,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生成中的“处境真理”,那种为传统西方认识论所构想的一成不变的超然的理想表象不过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科学神话,不过是一种一开始就会把人类认识完全埋葬的巨大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论的“解释学转向”不仅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掀起波澜,亦在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哲

学中引起共鸣。后期维特根斯坦称理解一个语句就是理解一种语言，奎因说脱离了一定的语言手册语词的意义就不具有可译性，库恩则断言科学真理最终由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所规定。因此，如果说现代解释学是通过“视域”概念的推出以强调任何认识都不能脱离人的特定的认识条件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家则是以“语言背景”“翻译手册”以及“科学范式”等名义对这一境遇主义、历史主义的认识论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说明。殊途而同归，无论科学主义哲学家与解释学哲学家的表述如何不同，他们都坚持认识为一定认知条件所左右的非确定性，都无情地宣判了追求精确表象、追求“所予神话”这一认识的理想主义的死刑。

这毋宁说预示了告别理想的认识论的一种新的日常认识论理论的诞生。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想走，因此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去吧”。这里所谓的“粗糙的地面”即日常生活的地面。日常生活的地面不仅是我们生于斯、行动于斯、死于斯的生活场所，亦应该是我们认识于斯的思想渊源。而一旦我们使人的认识从理想的天穹回归到这片日常生活的现实的土地，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孕育出一种崭新的认识理论。而较之传统的认识理论，它具有如下别具一格的特性。

其一，如果说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把认识视为是一种表象形式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日常的认识论则把认识视为是一种生活形式。在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里，认识活动被看作为认知主体之于认知对象的映现活动，而真理即为那种在该活动中所呈现的严格符合的精确表象。与之不同，日常的认识论则从这种表象主义转向行为主义，认识的实质不是认知主体之于认知对象的一种反映论的表象，而是和人类其他行为方式一样，是生